

关于当代建设式图书馆学的思考

范并思

一九八五年秋,《图书馆学通讯》富有胆识地刊出了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以下简称《方向》)一文,开始了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本文不准备讨论《方向》一文的具体观点。我们赞同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应该从经验总结式的工作描述和经院式的空泛议论中解放出来,转入到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体的方向。问题在于,处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特定理论背景下,应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关于这点,我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

《方向》从全新的角度讨论了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对局限于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并以图书馆工作的描述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图书馆学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批评。不少见解是独到的,议论中不乏震聋发聩之处。这场讨论,把理论危机问题再一次提到我们面前。

危机感激发变革和创造性思维。图书馆学理论要发展,没有一点危机感不行。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界,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缺乏的不是危机感。每一个认真地了解过我国和世界图书馆学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关注着其它学科发展的人,都不会为我们的理论现状盲目乐观。相反,当前相当部分人的危机感中渗和了过多的理论虚无主义和无所作为的思想,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图书馆学深入发展的一种隋性力量。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说它是理论遗产也好,说它是理论

包袱也好,它就这么顽强地存在着,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打上它的烙印。这不但因为它是许多代人的理论工作的结晶,也因为它毕竟教育了新一代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已作为一种观念积淀在这一代人的意识中。因此,它注定要成为走向未来图书馆学的桥梁。如果仅仅有危机感,我们就只能在艾怨中一筹莫展。当前亟为要紧的是:我们不但要正视图书馆学理论薄弱这个现实,同时也要正视建设新理论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个现实。所以,我认为今天更需要的还不是理论危机感,而是建设新理论的责任感、使命感。

思考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不应忽视当今的建设式图书馆学这一特定理论背景。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走过一条漫长的批判式发展的道路。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大小小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兴趣始终是批判与反批判。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拨乱反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显著的进展。然而就研究方式来说,主流仍是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问世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对人为地加入图书馆学中的“左”的东西的清除作了一些努力,此后理论的政治批判沉寂了一阵。到一九八二年,又有人公开提出理论危机问题。理论界开始以《图书馆学基础》的内容和体系为参照系,对图书馆学基础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范围从图书馆学的定义、内容直到理论基础和逻辑结构。这次批判的内容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世界图书馆学史上是罕见的。包括后来张晓林同志等人批判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许多理论观点,在这一时期都得到

一定的清算。以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精神的下达,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了基础理论讨论会以后,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理论界的兴趣开始从批判转入了建设。

理论建设是比理论批判艰巨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工作。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理论建设,而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建设成果,却能使旧理论不经批判而自行消亡。新型的图书馆学理论只有通过艰苦的、脚踏实地的建设性工作才能产生和发展。只有理论建设可以开辟更多的认识路线,创造和吸收更有效的研究方法,为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远欠完善的原因,不是对原有理论批判不够,而是新理论建设不力。

二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格局,已基本开始了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化。理论批判在多元化格局中不再是理论建设的必要前提。这是理论发展方式由批判转入建设的理论环境。

一元化的理论格局中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它由唯一确定的研究对象、一种认识论基础、一种理论框架结构和一套研究方法所构成。在这种理论格局中,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必定要与原有理论观念发生强烈的碰撞。只有战胜了传统规律,它们才能够生存。“不破不立”是这种格局中理论发展的格言。建设新理论的人们首先要向传统观念挑战,花大气力打碎并清除原有理论,以获得新理论得以生存的空间,然后才有可能建设新理论。以往的批判式图书馆学发展方式或许是这种一元化的图书馆学理论格局的必然后果。

目前一种多个学派、多种学说并存的多元化理论格局逐渐出现,是理论界适应建设

式图书馆学的一种正确选择。多元化格局为新理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理论环境,在这种格局中,人们不一定非打碎旧理论建设新理论,我国图书馆学曾有“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等演化,因为当时只认一个体系,几种理论的出现则是取代的、排斥的。而现在的知识学派、交流学派、文献信息学派却能与原有理论并存,并不互相取代,现在的理论格局本身即由多个学派构成,仍以教材为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有关部门原来编的教材只供学校选用。

前一段开展的有关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因为研究者的视野中仍是图书馆学的定义、对象,图书馆的职能或由此派生的一些经院式研究的传统课题。因为课题本身的局限性,对解决研究方向问题不会起积极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有人沿着另一条认识路线得到一些与《方向》不同的看法,由此又引出一场“图书馆学是什么?”“图书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的讨论,我们的研究方向又有什么改变呢?

《方向》中的批判式课题,同以往的定义、对象、职能一样,仅仅是学科理论体系自我完成所需要的课题。然而,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完成的体系。应用性很强的图书馆学更是如此。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已具备条件从“定义”一类课题中解放出来,转入到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体的研究轨道上来。研究方向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若这种研究只是限于对已有理论的批判,我们就无法摆脱传统课题的纠缠,一扫经院式研究的陋习,真正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

三

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不只是理论家的笔战,也不是理论教科书中某些术语或

说法的修修补补。研究方向的转变应是整个理论界的理论兴趣的转变。因此,提倡一些建设式图书馆学研究应具有新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对研究方向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

1、提倡新的理论价值观 长期的封闭式、批判式图书馆学理论环境促成了一种与当代图书馆学的理论要求极其不相适应的理论价值观念。根据这种传统的理论价值观,学术论著是衡量理论成果的唯一依据,而决策方案的制定、论证、实施及产生的效益,却不能作为依据。如果有人对图书馆工作流程某一环节提出改进方案,并根据数据和运筹学知识进行可行性论证,使决策者采纳了这一方案。如果他仅将这一事实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别人也许要笑掉大牙。只有他把运筹学理论的应用作一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后,人们才承认他搞了科研。在这种陈腐的理论价值观的驱使下,不但从事理论和教学工作的人热衷于做大块文章,就是许多直接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甚至一些在决策部门工作的人,也对周围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并急需解决的应用性、开发性课题不屑一顾,争相以发表文章为荣。

《方向》一再强调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需求是图书馆工作的目的,但光强调是不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该解决达到这一目的的问题。这需要大批的图书馆学家在各个层次、各个环节上依据图书馆事业发展或图书馆内部工作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调节图书馆系统,改善系统的功能。因为这种研究一般有较繁重的数据收集或其它调查工作,数据分析有时得动用计算机,论证时常常还需要其它学科专家的协作,较之传统的纯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金和研究时间。但在传统的理论价值观的支配下,这类研究所需的经费、人员和时间都保证不了。以往的这种研究,是靠一些领导者的贤明或某些研究者的自我牺牲精神零星地开展。目前常见不鲜的

一种怪现象是不少图书馆愿出钱编印“学术论文集”,却很少有图书馆愿花钱聘请一批专家研究如何解决新书积压问题。显然,这种现象的根子不是某些个人的偏好,而是理论价值观作祟,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的勃兴是有目共睹的。大批的经济学家参与经济决策工作,经济调研方案的效益可作为很“硬”的科研成果上报。这种新的理论价值观,值得在图书馆学领域大力提倡。

2.学会多元化格局中的思维方式。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格局的出现,意味着在认识上不再存在绝对的理论统一体。各个学派可以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事物,并可以将自己的认识逻辑地演绎成体系。这些不同的理论体系,按照科学学家库恩的说法,是不能相互检验的。各个理论体系的生命力除理论内在逻辑的完善外,主要取决于理论的成功解释现有现象的能力和预测未来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说,要靠理论发展实践来检验学派学说的真理性。从一种学说的思想体系出发观察另一种学说的理论观点,无疑要看到大量差异。如果研究者仍保留着一元化格局中的思维方式,他们就不能容忍这种差异的存在,就要发议论,争出谁是谁非。而在多元化格局中,人们更多的加强理论建设,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增强理论的内在逻辑性、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方向》和《图书馆学通讯》后来发表的文章批驳了许多图书馆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许多只是“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并非全称的“图书馆学”观点。而《方向》提出的跳出图书馆这个社会机构,“面对整个情报交流和情报服务系统”开展研究的观点,基本属于“交流学派”的观点。这二种学派,尤其交流学派,本身也在竞争中发展着。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较大出入,各自的优劣还有待理论发展的实践检验。

因此,要真正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理论思维方式也必须适应多元化格局。也就是:1)在坚信自己理论的真理性的同时,对其它学派学说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2)在用自己的理论体系考察别人论点的同时,也用该论点所在的体系考察它。这样,也许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有更多的共同点。

3、容许一些“理论黑箱”。图书馆学研究方向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经院式研究风气。诸如“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的职能”一类传统课题,多年来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所最终解决的,往往还不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而力图在教科书或理论专著中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更富有“理论性”的表述。如果理论界的兴趣离不开这些课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是无法真正转变的。

图书馆学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信息社会初见曙光,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无穷尽的课题。作为一个面迎挑战锐意进取的学科,我们不应该被那些经院式研究的课题干扰理论思维。当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

有责任开一代研究新风,绕过那些课题,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现实性课题上。这里不妨借用控制论的“黑箱”概念,把那些一时纠缠不清而又与现实关系不大的问题当作理论“黑箱”,暂时不必去打开它,我们不必解决《方向》提出的“图书馆学哪里去了”的问题,也能针对图书馆事业或用户需求的现实需要,开展图书馆学研究。对于图书馆学这样一个尚处于剧烈动荡中的学科,容许理论“黑箱”的存在是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绕开理论“黑箱”,我们或许可以走得更快,更容易把握住理论研究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 1、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图书馆学通讯》1985年3期
- 2、徐人英:评图书馆研究方向的历史性进展《图书馆学通讯》1986年1期
- 3、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图书馆学基础》1981年
- 4、沈继武 刘迅: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5期

苏联出版《图书馆员手册》

由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编辑的《图书馆员手册》,一九八五年在苏联初次出版发行。

一九八四年三月,苏联联邦最高会议颁布了“苏联图书馆事业有关规定”的法令。这个法令集中收集了1920年、1934年、1956年、1974年以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发表的有关国家图书馆事业的所有重要决定。法令强调作为学术情报机关的图书馆在培养现代社

会公民的思想意识、提高文化和教育水平方面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指出,为了实现贯穿在法令中的这一指导思想,必须努力提高图书馆员的服务质量。

该书卷头转载了“苏联图书馆事业有关规定”的全文。目次顺序是:苏联图书馆体系,专业图书馆资料来源,图书卡片和目录,读者服务,书目业务,参考业务,图书馆工作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图书馆员的培养,图书馆员的待遇,图书馆最佳建筑结构、室内装饰、机械和材料,图书馆的机械化,国际图书馆团体,定期、不定期出版物。
(明德)

Summary

UAP in China

From 12 to 16 June, 1986 a National Seminar on UAP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Publishers,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who came from 23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ll over China attended the meeting. 43 reports were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Among them Mr. Shao's report entitled "UAP in China" was taken as the major one.

Shao provides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AP in China. Repor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bjective and scope of UAP. Following contents consist of five parts — users and their needs for publications,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publications, acquisi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lending, reten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publications.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spect of implementation of UAP. Bu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AP,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Constraints and obstacles are identified.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 appropriate measures are being adopted. (page 23)

A research on the earliest foreign languages translations of "Hau Kiu Choo-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The novel, Hao Qiu Zhuan, in eighteen chapters, was publish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is a tale of the marriage of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 Tie Zhong Yu and Shui Bin Xing. Although it is very lightly esteemed by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yet it was once frequently commended by foreigners in Europe and repeatedly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during the past centuries.

Nobody can definitely tell who the translator was or which original version, the Chinese or the Portuguese, the translator based upon, but it is still considered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Sino-British cultural relation or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age 66)

Contemplations on building up library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era

The article describes a change from critical to constructional attitude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some new values of theory and ways of thought be establ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page 75)

O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regarding Mao Yi's first four collations of the famous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Shuo Wen Jie Zi"

Based on his research, the author refutes the inference upon untrue evidences